

# “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

——读鲍坚的长篇小说《俯仰之间》

□潘凯雄

近日，我翻阅了鲍坚的长篇小说《俯仰之间》，这是一本特点突出且在当下创作中较为稀缺的作品，能让读者有此感受，实在颇为难得。

这部20余万字的长篇故事并不复杂，一号男主角辛平在国家某部委任中层副职，在主要负责人的信任下主持大数据管理系统“风云项目”的搭建。在推进过程中，一些下属的敷衍和合作单位的能力欠缺尚可克服，但某些上级领导看似道貌岸然实则各自心怀私念，给他带来种种困惑与掣肘。

尽管辛平努力在不损害单位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尽量平衡各方利益，但由于无从满足各方私欲，那个貌似最信任他的主要领导也终于露出真容，辛平由此陷入困境。在这条主线之外，作品还有许多主要人物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诸如怎样平衡家中婆媳关系，如何教育青春期的孩子，在享受志同道合朋友们友情的同时如何防备利益围猎者们的陷阱，等等。

整部作品阅读起来并不令人感到生涩与造作，而是自然自如。按一般的习惯思维，《俯仰之间》很容易被定位为所谓“官场小说”或“反腐题材”，或被评价成为“现实主义力作”，不能简单地这样说。这样的定位或评价就全然不对，但我又总觉得过于泛化，失之于粗。我个人以为，与其说这是一首现实主义力作，倒不如称其为是一首充盈着浓郁浪漫精神的理想之歌更为确切。

发生在《俯仰之间》中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可能存在，故事、人物甚至情节细节对话等都是十分真实的。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之余，这两条叙事线上发生的大事小事，但凡有相关生活经验者，都可能有过切身遭遇。关于这一切，鲍坚采用的是一种近乎白描式的笔法，几乎没有夸张和戏剧化的表现。尽管如此，我为什么还要坚持称其为是一首充盈着浓郁的浪漫精神的理想之歌呢？这样的判断不是源于作品表面上呈现出的故事和文字叙

述，而是源于作者隐藏其后的主观态度。

先看作品名，“俯仰之间”已然揭示出鲍坚鲜明的主观态度。“俯仰”者，低头与抬头两种状态是也，稍加引申便想起《孟子·尽心上》中所言：“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即抬头无愧于天，低头不忤于人，为人正直坦荡，古联更有“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的延伸。这显然是一种为人处事的基本姿态与心态，而支撑这种姿态的无疑是作者内心坚守的基本操守与信念。

再看作品主人公辛平为人处事的基本方式。一个国家级部委大数据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建设显然不是一项简单的日常工作，将这项具有全局性、挑战性、开拓性、投资大等特点的重大工程交由一位副司长主持，多少有点反常，由此自然令人联想到这是主要负责人对辛平的格外青睐与信任。辛平本人也不会对此完全麻木不仁，他对这份工作自然也就格外投入与认真，以不负部长的信任与厚爱。然而，在工程的推进与实施过程中，种种蹊跷与怪异让辛平渐渐明白了部长的用心所在，此时他本可以用乖巧的执行来换取自己职业的所谓前程。但辛平要守住自己内心的底线，终于导致自己的仕途前程就此了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辛平内心的纠结，但他不是一个行动的斗士，而是一个自我内心高洁的守护者。为此，他甚至早就有所准备，在自己夫人的老家一块名为君岭的地方，与友人合伙租下6户被村民遗弃的破旧老平房。这种选择自然会令人联想起中国历史上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归隐官吏，看似消极回避，本质也是一种理想的坚守。

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理想的坚守？比之于积极抗争，自然显得有那么一点消极避世的味道，但这也不表示他尚有正义、有理想存于内心吗？我们不能简单地要求所有的凡人都是英雄，更何况，辛平在工作之外，对自家婆媳关系的处理、对自己女儿的教育、对同事朋友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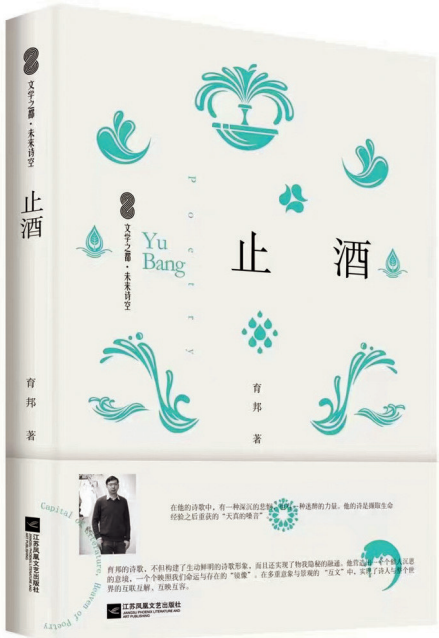
都依据自己心存的正能量来对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将鲍坚的《俯仰之间》视为一首充盈着浓郁的浪漫精神的理想之歌。

何谓文学的“浪漫”精神？所谓现实之不足，理想来补足就是其最基本特征。不认同、不迎合、不助力现实中的污浊，本身就是一种正义的人生态度，值得张扬、值得赞美，比之于那些积极抗争者只是表现程度的不同。后者固然值得学习，但前者同样值得尊重。由此，鲍坚《俯仰之间》所张扬的正是人间的一首正义之歌。

# 伐桐后，在树下对饮

——读育邦诗集《止酒》

□朱未



有的漂洋过海，而有些信件永远无法抵达。那些凝结着写信人心血和秘密的文字，也消逝于风雪之中。与信件告别，就像送别一位老友，结尾带有某种人生的况味。在该诗的第三、四节，诗人将经由信件生发的思考推向了更深更广处，邮递员送出的信件仿佛谜语，谜底只有写信的人知晓。年轻时那些或激昂或热烈的言语，如今仿若火焰渐渐熄灭，年年岁岁，土豆继续发芽生长，那些由稀饭和咸菜组成的日子，成为“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庙宇”。行文至此，读者不禁恍然大悟，诗人笔下的邮局正是我们所处的世界，那一封封信就是世界中的你我。诗人从作为经验的邮局出发，开启想象的旅程，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更有意义的真理”。

将诗歌的解释权交给读者

多义性是育邦诗歌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是代表育邦诗歌风格的重要作品，这首诗让我联想到保罗·策兰的《白杨树》。策兰在《白杨树》中呈现了5个“母亲”的形象：白杨树、蒲公英、含雨的云、圆星和橡木门。策兰以象征的形式，用这些意象代表了5种状态下的母亲，传达出去失去母亲的悲痛和自我身份的追溯。在《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中，“父亲”也出现了5次：抽烟的父亲、淌水的父亲、苍老的父亲、佯装的父亲、冷峻的父亲。育邦为这5位父亲提供了不同的出场背景和形象塑造，他们可以是一人，可以是5个人，也可以是千千万万父亲的缩影。该诗的多义性不仅表现在父亲的形象上，每节诗句的内部同样充满了多义。我们看

最后一节：

我从火苗中走出来  
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  
他提着一桶水  
是的，他要浇灭我

在育邦的笔下，火苗或者说火焰曾多次出现，这或许与诗人的趣味有关，也与火这一意象丰富的阐释性有关。该节中的火苗，读者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年轻气盛也好，愤怒暴戾也好，大抵与热烈的情绪有关。父亲提着一桶水浇灭了“我”，可以视为长者对年轻人的忠告，也可以视为父子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从“俄狄浦斯情结”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父子间的斗争从未停止。浇灭到底作何理解，诗人将解释的权力交给了读者。

优秀的作家总是能创作出包含冲突因素的文本，诗集名曰《止酒》，而书中却不乏关于饮酒的篇章。如“我们对着自己的影子饮酒/柳泉漫溢的泪水，清凉依旧。”（《访蒲松龄故居》）“戴斗笠的人，背对时光，/独自饮下黄滕酒。”（《天仙配》）“薄暮时分，我们取出烧酒，/对饮。一杯接一杯。”（《对饮》）内容与书名的冲突，使这本诗集的内外之间产生了某种诗意的张力。这类类似于打算戒酒之人喃喃自语的纠结，又像是诗歌文本对书名倔强的反叛。育邦在上一本诗集《伐桐》中这样写道：“伐木者听不到任何声响/他若尽其事，砍下那棵青桐。”当我把《伐桐》和《止酒》对照阅读，一幅有趣的画面在我眼前展开：伐桐的人劳作了一整天，暮色将至，他宽慰自己，还是明天再戒酒吧，于是摆上桌案，与友人在树下对饮开来。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选版”第三辑以跨越千年的“文化转向”为纽带，甄选初版以来加印多次、长销不衰的经典书目，不仅有着强大的翻译阵容，而且装帧设计结合古画元素与烫印工艺，极具美感与内涵，非常注重体现历史大场景中的小细节。此外，出版方思库还精选来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机构珍藏的历史绘画，为每本书设计了单独的明信片 and 藏书票，方便读者阅读收藏。

（苏文）

# 枯笔化仙骨，重墨写风流

——评路东的《不俗即仙骨·草圣林散之评传》

□孙冬

路东的《不俗即仙骨·草圣林散之评传》，讲述了一个出生于乌江小镇的乡绅子弟如何谋求生存、追求艺术卓越，最终成为“当代草圣”的生命历程，书写了中国当代书法大师林散之跨越百年的人生历史。

关于林散之的传闻和轶事很多，但作者在材料的选取上非常审慎，时间、地点、细节都力求准确。除了认真筛选和甄别通过收集调研而来的丰富史料，作者还接触到了很多不被外人所知的一手资料和证词，在非虚构的叙事中执拗求真，试图找寻一个真实的林散之。可谓敬重历史，用力甚深。

在讲述过程中，作者在回溯性视角、带人性视角、前瞻性视角以及非历史、旁逸性视角之间不断切换。回溯性视角在传记文学中是显见的，追忆和回顾大师的艺术道路以第三人称视角展开，还原当时的历史风云，详尽叙述林散之的家族教育、文化传承、交友云游、艺术追求以及晚年的成就和荣誉等，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在回溯林散之生平经历中，作者不断使用带人性视角让读者进入此时此刻的境遇之中，从当时的历史漩涡和个人生活的现场来还原事件的原貌以及人物的心理动向。这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视角的结合，不只逗留于个人生活的事实层面，还需深入到传主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是当下与历史同步的共时性视角。前瞻性视角是嵌入历史空间的一种当代视角，是一个虚构的空间，以一种后见之明更好地言说历史，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和主观视角。要说明和展现一个事件和一个时代，仅仅是当下视角是不够的，要回到过去向现在展望，或者从未来向现在回望。旁逸的视角不拘泥于个别历史事件和个人生活，是一种文艺评论和哲学思考的视角，属于在共同情境中敞开的无人称视角。这几种视角的穿插使用，让这部评传的话语维度更加丰富，历史叙事也更加深入和复杂。通过这种多重的、相互交织的视角的使用，读者不仅能够追溯林散之的人生轨迹，还可以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角度来考察将其挟裹在内在的客观世界。作者可以辩护和质疑，可以细致入微，也可以在高处俯视。

更主要的是，在展现事实的同时，作者可以择机夹杂自我的评判，在碎片化的事实上加上一条隐形的线索，并使其看上去同样客观和中立。

在书法艺术方面，路东虽然也有颇多研究，但他并不是书法家，非书法家的身份使得他避开了对于书法艺术以及书法门派的过多介入和审美偏见，也避免将这本书写成一本书法艺术评论。路东诗人和哲学家的身份深刻地影响了这本书的整体结构，书中用了不少篇幅在谈论林散之的诗歌创作和美学，可以看出他对林散之诗人身份的关注和认同。当提到被当代人冠以“草圣”的林散之将古诗诗作为自己的首要成就时，充满对传主不入世俗的执着追求的欣赏。书中对于艺术家和时代的有距离的认识，以及对于诗歌美学的阐释，也带有民间游散诗人的思考立场。最重要的是，该书展现出路东所关注的海德格尔关于“存在者”的“存在”观念，体现了“存在者”和“存在”的复杂关系。

如何了解人？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要通过人的“存在”来了解人。“人生在世”(In-der-Welt-Sein)说的就是人同世界的依存关系，离开世界就谈不上人生。因此，人生在世不是把一个独立于世界的人放进一个世界中去，指的是人同世界浑然一体的状态。人消融到他人和他物之中，并不在他所繁忙的事情之外生存，人就是他所从事的事业和他过的生活。人和他人不可分，也就没有了通常意味中主体和客体的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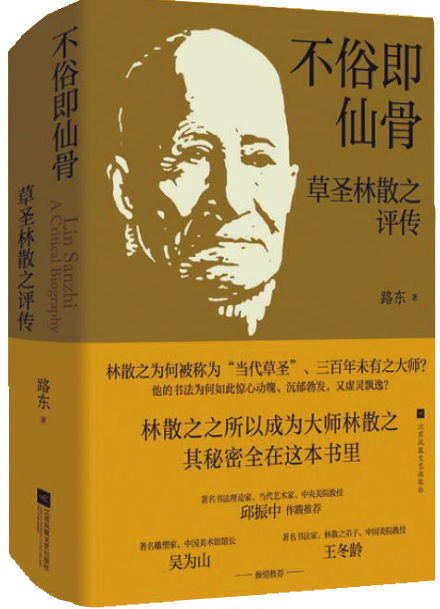
熟读海德格尔的作者在写林散之传记的时候当然不会简单地去写一部个人史，而是要在整个文学史、艺术史、文化史、近现代史，甚至整个世界史和世界文化史上找出林散之的位置。如果说，每个生物都在自然中有一个生态位的话，那么每个“存在者”也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位。这个文化位在哪里？林散之是如何抵达的？这个文化位和其他文化位之间的关系如何？每个文化位包含何种变化潜力，又将要去向何方？这些都是路东所关注的问题。

在本书中，林散之的文化位是历史、政治和文化力量相互角力的结果。林散之生于变法之年，他的艺术也经历了痛苦的变革，个人精神和世俗生活、生存需要与艺术追求相互撕扯，一方面历史在塑造着个人，另一方面，个人也以微弱之力塑造历史。“存在者”和“存在”在发生关系，历史塑造和自我塑造，不断处在协商和对抗之中。造化之力和历史的远距离纠缠，在大变革时代会异常戏剧化，其剧烈程度往往是个人难以招架的。在描绘这一冲突的过程中，人已经事件化了。有意思的不仅仅是那些能够呈现出来的事实和个人能够作出的评判，只要读者们细心留意文本，那些沉默的历史、貌似断裂的叙述以及闪烁其辞的话语，总是在黑暗中闪着微光，更加耐人寻味。

在文化归位的途中，路东绕开了人们容易妥协或已经接受的事实和立场，深入到历史晦明不定的部分，在知识、情感和艺术的阐释学层面去揭示一个复杂的、真实的林散之：一个精明的痴人，一个识时务的旧文人，一个不立危墙之下的幸运儿，一个渴望世俗成功的艺术家。这些评论和描述，可能会让林散之的崇拜者感到不习惯，但也正是这些评论，才让大师林散之从抽象的文化象征物重新回到具体和独特的个人。一个非虚构作家可能永远不能掌握全部真相，但至少可以鼓足勇气做到最大限度的探索和最大限度的诚实——诚实地展现客观世界，诚实地报道我们的感受和评价，诚实地暴露我们的困惑和怀疑。

路东的《不俗即仙骨·草圣林散之评传》可以说是一个问题型的叙事，不是要提出一个单纯的、陈述性的论断，而是要提出疑惑，尝试去解决这些疑惑。在言说一个林散之的事件或者林散之现象的文本中，作者提出的是：个人如何在历史中安身立命？生命的完成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如何？生命的无着和无目的状态如何被艺术所改变？一个人的成名和变法要多偶然和必然的因素才能造成一种质变？在社会变革和转型中，一种传统范式的极端变化，需要怎样的进程和牺牲？当然，这些问题还包括林散之对于当代具有何种意义，作者的自我和林散之之间的关系，是否已在写作中经历了转变。当林散之在书的结尾不可避免地走向个人生命终结的时候，这些也是留存在我们头脑中的问题，期待读者也能参与和贡献解决方案。

在非虚构作品中，认识一个人、了解他的生平是阅读的首要目的，而跟随一个好奇和敏锐的头脑，见证它如何深入内心又如何置身事外，或者将一个司空见惯的事件处理得复杂和深刻，则是非虚构能够给予读者的另一重乐趣，从这个意义上说，路东做得非常成功，或许可以说，此后对林散之的相关研究已经不能绕过这本书。



# 把目光投向更深广的中国历史空间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选版”第三辑近日出版

从宋辽到清末，中华文明在内外张力的驱动下，如何构筑起了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北宋到南宋，中国人如何从外向趋于内敛，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民族文化品格？从边疆到江南，马背上的朝廷如何将大一统的帝国运转自如？从天潢贵胄到精英家族，权力博弈下的个体命运又将如何呈现？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选版”第三辑近日全新推出《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30—1785）》共6部海外汉学名作，把目光投向了更为深广的中国历史空间。

在美国汉学界影响巨大的《中国转向内在》一书，是宋史学家刘子健（James T. C. Liu）晚年总结自己毕生研究成果而写

成的，英文原版问世于1989年。作者认为，“中国转向内在”的关键是新儒家提供的改变社会的方式，国学大师钱穆的判断“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也在本书中得到深刻而全面的诠释。《天潢贵胄》奉献给读者的是宋代宗室充满传奇与变幻的历史长卷，其中有娓娓的史实叙述，也有深刻的制度检讨。作者贾志扬（John W. Chaffee）视野宏大，议论纵横，重绘了赵宋宗室300余年的千里江山画卷，作者扎实的研究为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其他皇室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与聚焦宗室不同，《权力关系》着眼于两宋宰相家族和浙江婺州地区本土精英家族，以精英家族的兴衰观察两宋社会变迁。作者柏文莉（Beverly Bossler）梳理大量史料，从墓志铭的内容变化考察唐宋社会风尚，是宋代社会史领域的一项重要收获。《忠贞不贰？》的作者史怀梅（Naomi Standen）来自于英国伯明

翰大学历史学系，她改变了以往以民族主义概念观察历史问题的视角，将燕云地区部分汉人官员和将领依附契丹政权的史实作为切入点，重新探讨了从唐灭亡至宋辽“澶渊之盟”间这一复杂时期内忠君观念和边界意识的变化，以及族群间文化冲突与认同等重要问题。《危险的边疆》是人类学家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的代表作，作者以人类学的全新视角对游牧世界的内部结构进行深入挖掘，构建了游牧部落的“双重策略”和“二元体制”模型，提出“游牧帝国与强大中原王朝共生”的解释范式，有助于形成对草原世界与中原文明之间复杂而有机的互动历史的超越性理解。《马背上的朝廷》是海外清史研究的代表作，作者张勉治（Michael G. Chang）以乾隆下江南为切入点，阐释了清帝国核心与江南之间既充满张力又持续博弈的关系，是对18世纪中国的全景式、多层次展现。